

中国人民大学

Renmin University
of China



性社会学研究所

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
Sexuality and Gender

<http://www.sexstudy.org>

[首页](#) | [学科建设](#) | [基础研究](#) | [应用研究](#) | [著作发布](#) | [图书检索](#) | [通俗文章](#) | [文献介绍](#) | [讨论地带](#) | [通讯文档](#)

您的位置: [首页](#) -> 男性问题

自慰，不仅仅是青少年的问题

作者: 潘绥铭 等 来源: 《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》第四章 类别: 男性问题 日期: 2007.04.02 今日/总浏览: 5/1471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4年2月出版, 41万字。ISBN: 7-80190-131-2 / B.008

潘绥铭 等: 《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》第四章

(全文版权所有)

自慰，不仅仅是青少年的问题

自慰无疑是一种正常的性行为；但是在中国人里，究竟有多少人有过自慰，人们却莫衷一是。近年来，许多性知识资料为了普及“手淫无害”的观念，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慰的发生率。其实，自慰的人很多，并不能想当然地证明它就是正常的；反过来，即使自慰的人很少，也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不正常。自慰之所以是正常的，其中的道理要比发生率的多少，更加深刻。

我们的调查发现：在20—64岁的中国人里，一生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性占30.1%。在女性中，有过自慰的人要少得多，只有6.8%。但是在城市女性中，这一比例却高达10.5%，是农村妇女（4.9%）的2倍多。

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，有22.6%的男性仍然有自慰。也就是说，自从小时候开始自慰以来，男人中有84%的人一直自慰到如今。

在女性中，有5.8%的人在调查前的一年里仍然自慰。也就是说，自从开始自慰，有84.5%的女性会一直自慰下去。

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自慰？

在男性中

1. 自慰是新时代的行为

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年龄，也就是说，越年轻的人，自慰的越多；每年轻5岁，男人发生自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%。例如，在55—59岁的男人里，有过自慰的人只占12.6%；可是在20—29岁的男人里却达到42.7%，在25—29岁的男人里更是高达47.2%。

这里面，青春期（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）的提前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。但是所谓年龄的影响，其实更多地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。如果按照男人们进入青春期时所处的历史年代来看，情况就会一目了然。

在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男人们，有20.9%有过自慰，说明那时候并不是一个压抑青少年性欲的时代。但是到了“大跃进”以后，自慰的发生率下降到18.7%，到了“文革”后期再次下降到14.7%。看来，那个时代可真是“伟大”，居然把男孩子们如此隐秘的自慰活动都给减少了！

可是，时代一变，万物皆变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，男人里的自慰发生率一跃增加到41.2%，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所谓的“回归传统”。

这种情况说明了性社会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：再隐秘的性活动，也并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，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强大影响。

具体来说，可能有三方面的社会因素，促进了自慰比例的上升和平均年龄的提前。

首先，最近20年来，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性信息飞速增长，不但是非法的色情VCD，就连最正规的官方电视节目里，尤其是广告，各种性的表现与性的信号也是铺天盖地。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，可是也为青春期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、令他们的父母无法预计的自由想象的空间。结果，年轻人的性幻想无疑是增加了。例如，在20—24岁的男性中，有17.6%的人是每天都想性或者一天想好几次，是所有年龄段里最多的。

其次，中国青年有一个平均6年左右的“性待业期”。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漫长的。在这个时期内，他们没有合法的婚姻，又缺乏必要的财力与胆力去从事性交易，就连“一夜情”也并不那么容易获得。因此自慰就越来越成为首选的性释放途径。例如：在20—29岁的单身的而且几乎没有性交机会的男性中，差不多每天都会想性的人，达到38.7%。

第三，在最近这些年以来的青年社会里，自愿或者不自愿的“独处”开始增加。这是由于一种现代社会里必然发生的“二律背反”：通讯手段越发达，人际交往的机会越多；人情味反而越淡漠，人的内心反而越孤独。在这种社会环境中，性的交往表面看来越来越容易，其实它所需要的资源与能力也越来越多，遇到挫折与痛苦的可能性也越大。

最典型的，莫过于现在城市青年里的“网恋”了。它是时下的“网络崇拜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可是如果你缺乏了相应的社会地位、闲暇时间、交往能力、个人魅力等等因素，网上的机会再多，又能成功几次？还不是“见光死”（双方一见面就吹）？所以，相当一部分青年会在“疯狂扩张”的同时，“知难而退”地固守自己的“心灵城堡”，形成一种“外松内紧”甚至是“外强中干”的人格倾向。最后有可能发展为“网痴”。

这样，自慰也就越来越多地具有了自我精神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证明是：仅就单身男青年而言，自己外出的时间越多（但是不到半年）、参加社会交往的频率越高，性交往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多；可是，发生自慰的比例反而也越大。在社交最频繁的男青年中，发生自慰的比例可以高达44.2%；外出最多的更是达到62.5%；可是在那些从来不社交的男青年中，却只有10.9%的人自慰，从来不外出的则只有19.1%的人自慰。

总结上述三种原因，从发生率上来看，我们认为，第三种原因是最主要的。

2. 自慰不是城市生活的产物

名列第二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己的家庭背景：在14岁进入青春期前后，越是居住在农村和乡镇里，那么发生自慰的就越多（31.3%）；反之，越是居住在县城以上的城市里，自慰的人就越少（23.4%）。从logistic回归分析来看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，14岁的时候居住在县以上城市里的男性，发生自慰的可能性，只是居住在农村的男性的48.5%。

这个发现很令人惊讶。人们一般都认为，农村人很“封建”，城市人却相对开放。可是我们的调查表明：在是否自慰这个问题上，情况却恰恰相反。这可能是因为：“自慰伤身”这种需要一定文化氛围支持的意识形态，只能在城市人口中流行；而农村人口则是抱着“顺其自然”的态度，因此对于自慰的社会舆论压力就比较小。

3. 自慰是一种“高文化活动”

排列在第三位的影响因素是自己的文化程度，而且成正比：越是文化低的人，发生过自慰的就越少。在没上过学的男性里，有过自慰的只占18.2%。再往后，文化越高，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：上过小学的就增加到26.9%，上过初中的再增加到31.8%；上过高中的是34.9%，上过大专的是35.9%，上过大学本科的则高达44.4%。

反过来看，如果与上过大学本科的男人相比，那么在那些没上过学的人里，发生自慰的可能性只有21%。即使是那些上过大专的人，自慰的可能性也只有本科毕业生的54%。也就是说，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，发生自慰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18%。

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。自慰是一种以精神活动为主的行为，主要内容并不是手的动作，而是脑的幻想。因此，受教育程度越高，产生幻想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幻想的内容也就越丰富，结果有过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情况反过来也一样：如果按照百分制，把上过大学本科算作100分，没上过学算作8分的话；那么有过自慰的男性，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分是61.2分，可是从来也没有自慰过的男性，得分只有47.9分。经过回归统计，证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，是否有过自慰这一情况，确实与受教育程度呈现为显著相关。

4. “发福”者自慰更多

我们还有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发现：越是现在肥胖的男性，有过自慰的比例越高。在那些不瘦不胖正好的男性里，自慰过的比例只是28.2%；在过瘦的男人里只不过是29.0%，差别不大。可是在超重和肥胖的男人里，这个比例却达到36.6%和35.1%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证明：现在是否肥胖与是否有过自慰，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相关。还有一个旁证：男人现在是不是想减肥，也与是否有过自慰显著相关。

可惜，由于我们并没有调查人们的其他生理情况和生活状况（例如营养摄入、体育锻炼等等）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，究竟是年轻时的“肥胖可能性”引发了自慰呢，还是当年的自慰引发了如今的肥胖？也许，在引进了其它诸多因素之后，这两种情况就不相关了？

在女性中

女性是否有过自慰，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她的受教育程度。

在没上过学的女性中，发生过自慰的人仅有0.3%，在上过小学的女性中是1.2%。可是受教育越多，发生率就越高：上过初中的是10.7%，上过高中的是15.4%，上过大专的是16.9%，而上过大学本科的则高达30.8%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女性连初中都没有上过，那么她就基本上不会发生自慰。可是只要上学超过6年，那么女性念书越多，发生自慰的也就越多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，发生自慰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2.15倍。或者反过来说，那些上过大学本科的女性发生自慰的可能性，是那些仅仅上过小学的女性的50倍，是那些从来也没有上过学的女性的500倍。

如此强烈的反差实在令人大吃一惊。它比男性中的情况更加突出。尤其是，除了受教育程度这样一个因素之外，我们所调查的其它所有因素（例如年龄、家庭背景、身体状况等等），统统与女性的自慰发生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一个可能性是：女性确实如此。与男性相比，她们的自慰更加是一种精神活动，因此更加依赖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。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：由于我们对于女性的自慰还缺乏深入的研究，所以我们很可能还不能提出很好的假设，结果我们也就无法发现女性自慰的深刻原因。

尤其需要我們注意的是：现在20—24岁的女性是崭新的一代。她们的自慰发生率一跃达到22.4%之多，是上一代女性（从25岁到44岁）的3倍到5倍左右。尤其是，在她们中间有63%的人仅仅是初中文化程度，高文化的很少；可是即使在这些文化并不高的年轻女性中，自慰发生率也已经达到20.4%之多。与之相对照，在上一代25岁—44岁的女性中，初中文化者的发生率只有8.4%。这足以说明：这确实是一种代际发展，而不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自慰方面的女性革命，已如旭日东升了。

从何时开始自慰？

1. 性别差异

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，有过自慰的男性，是在平均18.6岁的时候开始自慰。女性则是在平均22.2岁的时候开始。
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。它表明，男性在首次遗精（17.3岁）之后仅仅一年多就开始自慰了；可是女性却是在月经初潮（15.5岁）之后，过了将近7年才开始自慰的。

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现有的“性知识”出错了。

人们通常都认为，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就意味着性发育开始了。由于女孩子的月经初潮比男孩子的首次遗精要早，因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，女孩子的性发育也比男孩子早。甚至据此认为，女孩比男孩更容易“出问题”。古往今来，一切偏向于管束女孩的“双重道德标准”，都有可能是来源于此。

可是，月经初潮、乳房的发育、体征的改变等等，其实只不过是各种生殖功能的发育而已，只不过意味著女孩子从此具有了怀孕的可能性而已。如果从真正意义上的“性”（而不是生殖）的角度来看，人类最早开始的性行为就是自慰，可是在女性中，自慰并没有随着月经初潮而自然地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女孩子的生殖功能发育了，但是“性”却并没有马上随之发育，而是拖后了将近7年之久。

况且，有过自慰的女性只占区区6.8%。这说明，大多数女性其实是在自己的“性”尚未发育的时候，就不得不投入婚姻，不得不开始异性性生活。结果，她们的所谓的性发育，其实只是实现了两个目标：具有生孩子的可能性、具有被男人操的可能性。这两者都是社会对于女性的强制规定，仅仅是为社会服务的。可是她们自己的“性发育”——最能够满足自己的性要求的自慰，最容易使自己得到性高潮的自慰，却被基本上阻断了。

反之，男性的首次遗精不仅仅是生殖功能的发育，也同时是性发育。因此他们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“性生活”——自慰。在自慰中，他们不断地学习到性行为的方式，不断体验到性高潮的神奇与美妙，因此他们才能够从那时起就一直具有强烈的性冲动。

细想起来，男女这种在性发育方面的天差地别，实在是具有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女人在性生活里，尤其是新婚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是倾向于消极和被动？绝不是什么羞耻心和观念保守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到结婚时为止，她们自己的性还根本没有发育起来。反之，为什么有许多愿意尊重女性的男人，一旦投入性生活，就那么不管不顾了？就是因为他们的性发育太早了，而且“待业”多年了。

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从自慰早晚这个问题上，可以对传统社会的性质洞若观火。它就是要阻断女性自己的性发育，就是要把女性变成一个生育儿女的工具，一个被男人性交的对象。而且，正因为社会认为女性的自我性发育会破坏这样两个“大目标”，所以才格外努力地去阻断她们的性发育。

也是因此，在新时代里，如果任何一位号称“女性主义”的人，仍然不肯、不敢、甚至耻于大张旗鼓地宣扬女性自我之性；仍然把性视为男人的专利，甚至是“欺压女人的工具”；那么我们还是躲他们远一点，让他们自我陶醉于精神自慰中去吧。

2. 代际差异

开始自慰的平均年龄，只是一个总体平均数，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思，因为无论男女，在这个问题上的代际差异都非常之大。因此我们主要来看看代际差异。

在男性中，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，如果有过自慰，那么平均是从20.2岁开始。到了“大跃进”之后，这一平均年龄降到18.1岁，但是在“文革”初期，它再次上升到20.0岁，即使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也仍然保持在19.4岁的高位。也就是说，“文革”不仅减少了男孩子们的自慰发生率，而且推迟了开始自慰的年龄。这种“一箭双雕”的局面，只能说“文革”中的性压抑实在是令人齿寒。只有柳暗花明地到了改革开放初期，自慰的开始年龄才再次回落到18.1岁，与“大跃进”之后的那一代人相同。随后，直到1989年之后，自慰的开始年龄才低于历史记录，下降到了17.0岁。

这是一幅多么鲜活的历史画卷啊。在它面前，任何主张“手淫有害”的理论都站不住脚。真实的情况是：恰恰是“文革”那个性压抑的时代里，“手淫有害论”才能甚嚣尘上，才能对男孩子们发挥切实的作用，才能真的在降低自慰发生率的同时，把开始年龄推迟。

在女性中，这种社会历史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突出。

在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女性中，如果开始自慰，那么平均是发生在32.0岁。到了“大跃进”之后，下降到平均25.1岁，在以后的时代里则是再降到而且一直保持在21.4—22.6岁之间。可是1989年之后，在现在20—25岁的女性中，自慰开始年龄一举下降到17.5岁，落差达到4—5岁之多，而且已经与男性的开始年龄相差无几。

上述情况提示我们，就自慰的开始年龄而言，单纯的“生理决定论”同样站不住脚。人们通常都认为，近年来，由于青春期在提前，因此自慰也越来越早；或者认为，由于青少年缺乏实际性行为的机会，所以自慰的比例才越来越高。可是我们的上述数据表明：恰恰是在性行为的机会近乎于无、青春期却已经开始提前的“文革”时代，男孩子们的自慰比例下降了，开始年龄推迟了。难道他们就不需要靠自慰来释放自己的性能量吗？可是他们却不敢自慰，甚至可能连有这种释放方法都不知道。这，怎么会是“生理因素”使然呢？

丈夫的自慰

人们大多认为，自慰只是年轻时的一种性能量释放方法，结婚之后就用不着了。可是情况并非如此。在我们的数据中，在我们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，在那些已经结婚（或者长期同居）而且并没有分居的男女里，仍然有21.9%的丈夫和4.8%的妻子有过自慰。

如果我们排除那些从来也没有自慰过的人，只考察那些曾经有过自慰的人，那么在这些人结婚或者长期同居之后（本年度刚刚结婚或者同居的除外），居然有70.9%的丈夫仍然自慰过，只不过其中有70%的人只是一年之内自慰几次。

由于仍然自慰的妻子比较少，所以我们下面分析一下那些仍然自慰的丈夫们的情况。请注意，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并不是所有有婚男性的情况，而是那些曾经有过自慰的男人，在婚后或者已经与女性长期同居之后，为什么还仍然自慰。

1. 在曾经自慰过而且有婚的男人中，最年轻的丈夫和“人到中年”的丈夫，婚后仍然自慰的最多，在20—24岁和25—29岁的丈夫中，继续自慰的占到100%和94%。在45—49岁和50—54岁的丈夫中，则是73.4%和72.0%。

最年轻的丈夫们继续自慰，这可能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他们自己精力旺盛，妻子却还在性的适应期之内，所以不得不继续靠自慰来解决问题。

可是中年丈夫的情况，则很可能是一种“婚内性生活疲劳累积”的现象。这可能是由于妻子过早地停止了性生活，所以丈夫不得不自慰。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在长期的夫妻性生活之后，丈夫们自己必须采用自慰这种最能适合自己需求的方式，才能够获得心理与生理上的更多满足。

因此我们不惊讶地看到：在25—29岁而且继续自慰的丈夫中，只有17.4%的人是每个月都至少自慰一次以上（直到每星期自慰几次；其余的人则是每年仅仅自慰几次）。可是在45—49岁而且继续自慰的丈夫中，却有高达47.5%的人是每个月自慰一次以上。可见，所谓的“中年逃避”现象有多么突出。

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情况也是一样的。恰恰是在结婚之后的10—25年之间，丈夫们继续高频率地自慰（每月一次以上）的比例最高，达到41%—50%之间，比再老的丈夫们多出40个百分点左右，比结婚5—9年的丈夫多15个百分点，比结婚1—5年的高28个百分点。这就是“婚姻疲劳”的证明。

可是，话还没有说完。上述情况其实有很大的虚假成分。因为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：真正发挥着最显著作用的，其实并不是丈夫们自己的年龄，而是他们与妻子之间的年龄差。

最容易继续自慰而且自慰次数最多的，是两个极端的丈夫们：比妻子小2岁以上的、比妻子大6岁以上的。在前者中，73%的人每月自慰一次以上；在后者中，这一比例则高达79%。可是那些比妻子只大1—2岁的丈夫们，却只有19%的人能够达到这样高的频率。（说的都是在继续自慰的人里。）

这说明：丈夫们的继续自慰以及其频率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妻子决定的。少夫老妻的情况好理解，因为妻子往往较早就退出性生活了；丈夫不得不自慰。可是老夫少妻是怎么回事呢？按照一般情况来说，既然少夫们可能把自慰作为一种“补充”，那么老夫们应该是把自慰当作了一种“逃避”的手段。

再深入分析下去，这样的丈夫为什么想逃避与妻子过性生活呢？

丈夫逃避的原因

第一，性高潮缺乏。

那些在夫妻性生活里完全没有性高潮的丈夫，与那些每次都有性高潮的丈夫相比，继续自慰的比例增加了22个百分点；高频率自慰的比例则增加了26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丈夫是因为从妻子那里得不到性高潮，才逃避夫妻亲热，才继续高频率地自慰的。

第二，性生活时间太长。

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，在那些继续自慰的丈夫里面，如果认为与妻子的性生活时间太长，那么就会有56%的人每月自慰几次；还有25%的人则是每星期自慰几次，总计达到81%之多。与此相对照，在那些认为性生活时间太短的丈夫里，却只有26%的人能够达到每月自慰一次以上，其余74%的人是每年仅仅几次。

男人居然觉得性生活的时间太长，这恐怕比较“离奇”。可是这恰恰说明：那些高频率自慰的丈夫们，确实是在逃避着与妻子的性生活。这也许是因为在性生活里，妻子要求的时间真的太长；但是同样可能的是，恰恰是因为丈夫已经想逃避，才会觉得时间太长的。

第三，妻子对他们的吸引力减退。

我们询问道：“有些人，在与自己的爱人过性生活的过程之中，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。在过去的12个月里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？”结果，那些说自己有过这种性幻想的而且曾经自慰过的丈夫们，有29%的人仍然有自慰，而没有性幻想的丈夫却只有9%是这样。再进一步看，在仍然自慰的丈夫里，没有性幻想的只有25%的人是高频率自慰（每月一次以上）；可是在有过性幻想的丈夫里，仍然高频率自慰的人却高达48%。

第四，对于妻子的“性能力”的某些“恐惧”。

这表现在：如果正确地知道女性的性高潮是什么样，丈夫继续自慰的比例就增加8个百分点。如果妻子很懂得性技巧，丈夫的高频率自慰就增加16个百分点。尤其是，那些觉得妻子的“魅力”比自己大得多的丈夫们，继续自慰的比例会增加30个百分点。这三个方面，都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。这说明：不管妻子实际上有没有性高潮，也不管她是不是真的“性技巧高超”或者“魅力十足”，如果丈夫这样认定了，就会对他自己造成某种心理压力，就会促使他以自慰来逃避夫妻性生活。

第五，丈夫自己的错误的性观念。

那些相信“劳色伤身”的古老神话的丈夫，继续自慰的比例就会降低10个百分点；高频率自慰者就会减少7个百分点。此外，那些认为女性不应该同等地享受性生活的丈夫，继续自慰的比例就会增加26个百分点。

其他原因

1. 男人的自慰往往发生在没有女人的情况下，因此，那些外出超过半年的丈夫们百分之百都继续自慰过，而且有69%的人是每星期自慰几次。

2. 继续自慰的“物质基础”是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因此，不够健康的丈夫中只有60%继续自慰，而且其中91%的人仅仅是一年自慰几次。可是在非常健康的丈夫中却有76%继续自慰，在比较健康的而且继续自慰的丈夫中，有26%是每月自慰几次，还有14%则是每星期几次。

3. 许多性知识普及小册子都说：吸烟会极大地损伤男人的性能力。可是我们的调查数据却发现：虽然不吸烟的丈夫们继续自慰的比例，高于每天吸烟一盒以上的丈夫们（80%对71%）；可是如果看看继续自慰的次数，那么情况就反过来了：在不吸烟而且继续自慰的丈夫里，每月自慰超过一次的人只有28%。可是在每天吸烟一盒以上的丈夫里，却有23%是每月自慰几次，还有21%则是每星期自慰几次；总计多达44%。

同样，许多小册子也宣传说喝酒多了会降低性能力。可是我们的数据说明：喝酒越多的丈夫，越是把自慰持续到现在。在那些从来不喝酒的丈夫里，只有60%是这样；可是喝酒越多，这个比例越高，直到那些经常喝醉的丈夫，这个比例高达92%。

当然，这并不能证明吸烟多、喝酒多就有好处。它只是提示我们：在关于“性”的一切问题上，仅仅靠生理学或者医学的知识，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。

这里主要关注的是：自慰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现象，如何被构造成为社会规范的作用对象。社会对它的态度的变化，折射出了大的社会历史进程。自慰从不被重视到被压抑，再到被认可，透射出了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。

1. 身体的历史与地理

对身体的态度从来就有两种：一种将身体看作劳动的工具，生产的工具；另一种将身体看作享乐的工具、消费的工具。

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，生产是第一要务。这一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、文化产品的生产，也包括人口的生产，即生殖。从前一种生产的观点来看，生殖器（性器）毫无用处。胼手胝足、重担在肩、绞尽脑汁、费劲心机，所以手、足、肩、脑、心都是有用的。可生殖器（性器）不但什么也干不了，简直就是个累赘。但如果绕到另一面来看，在人口增殖过程中，生殖器的作用却又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其它哪一部分可以代替。所以它在历史上受到狂热地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绵延至今，实行了计划生育，我们在口语里还管它叫生殖器，尽管这个叫法已经有点勉强。

在另一方面，身体作为享乐的工具成为上层男性的专利。因为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里，只有他们可以逃避第一类生产的任务，可以专心享受身体所可以提供的快感。但是整个社会普遍的物质匮乏又使这种享受不能名正言顺；于是道德、礼教应运而生。上层阶级与我们想象的相反，往往比下层民众更加重视禁欲和修养，尽管很多情况下只是表面文章。这种禁欲和克制对肉体力量以另一种力量加以利用：我可以，但我不做。由此获得道德上的力量，使上层的统治合法化，使下层的禁欲合理化。

由此可以侦知传统社会对待自慰的观点。自慰有三个特点：

1. 不承担生殖义务，
2. 纯消费行为，不能直接生产什么，
3. 自我指涉，回绝与他人的关系。

这三个特点都与物质匮乏社会的组织原则背道而驰。

它不生产，联系我前面的分析，这与社会的根本信念正好相悖（想想“社稷”）；无论上层、下层、男人、女人都无法赞同。

它不与他人发生联系，这在讲究和衷共济、守望相助的社会里是不可接受的，在一个按照“人的本质就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”的原则构造起来的社会里也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它们都强调关系、轻个体，看重的是个体之间的同质性，个人隐私越少越好。

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，权力的运作开始逐渐精细起来。按照福柯的观点，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就是对肉体的严密控制，通过一系列的装置（Apparatus）将权力分解开来，贯彻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：监狱、军营、学校、医院... 在日常生活中规训每一个人。

人的身体在这一过程当中成了各种权力运作的交汇点。对身体和生命的控制被福柯分成“权力的微观物理学”和“权力的宏观物理学”。围绕这些权力，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知识：医学、解剖学、心理学、人口学等等，它们和权力一起牢牢控制了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
性在其中正好把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联系起来，它既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又可以化作统计数字在国家范围内管理。（这里恐怕福柯把生殖和性混为一谈了，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，待查。）因此，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。

福柯在其《性史第一卷》中驳斥了那种认为权力单纯压抑性冲动的看法，认为三个世纪以来，性的话语其实是在不断增殖的。每个人都认为，性当中蕴涵着自我的秘密，需要不断地坦白，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权力的压迫。在对英国反对儿童手淫运动的分析中，福柯认为这是规训技术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结果，其原因非性的。我的观点也一样——对待性的态度的原因要到性之外去找。

2. 走出边缘

现在的社会，怎么说呢，叫它后工业也好，资本主义晚期也好，初步实现了温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，总之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众谋生容易点儿了，物质资料相对丰裕，至少不会一个灾荒就闹得饿殍千里了。

对了，还有一个词儿，叫作消费社会。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，至少在城市里是如此。消费不光是付出金钱、权力，同时也要有身体参与其中，即对身体的消费，例如登山、跳舞、滑冰等等，消耗了热量，获得了肉体上的满足。身体，作为享乐的工具开始显露出了自己的另外一重面貌。当然，也可以说这是权力对身体的另外一种控制，甚至可以说这是更高明更严密的控制，但不容置疑的是至少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隐私了。

福柯对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发展起来的“坦白”技术作了详尽的剖析，大意就是：这种隐私就象凉山白彝的家产一样，看起来象自己的，摸起来很有自我实现的感觉；可是实际上只不过是黑彝来业的小金库，说没有就没有了，只让你暂时有种坐稳了奴隶的自豪感而已。（福柯书中的权力概念远不是这么拟人化的，我把它简单化了。）

由此似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我们的隐私也是如此。可细究起来，中国全没有那种清教传统，对忏悔也没有西方人那么熟练，唯一可媲美的是“坦白交代”，可那是外力作用而非内化了的渴望。因此可以说，中国人（好大的概念，我用着有点不放心）是没有隐私观的。城市化还没多久的中国人，习惯的还是农村里的人际关系范型，即无隐私这一概念。这样说来，城市生活带来的隐私观尽管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还是一种进步。

网上有数据表明，网民经常自慰的有57%，偶尔自慰的有38%。当然，网民中男多女少，年轻者多而年长者少。但已经可见自慰是青年男女除正常性行为外的一种极普遍的性活动。以往的观念将其看作是正常性行为的一种模拟、一种增补，总之是附属而非主要，是边缘而非中心，正如缺席的文字是对在场的语言的增补一样。但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客观存在，又不禁令人心生疑惑：它是不正常的吗？它仅仅是一种“增补”吗？

第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。刚开放的几年里，在青春期性教育手册里还可以看到把自慰和黄色毒害—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。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众医学杂志里，已经将其带来的危害局限在心理范畴了（即不把它当回事就没事）；但仍不忘劝告青少年朋友要将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九十年代，已经有人在公开宣扬自慰的乐趣，至于“自慰对身体的危害”已经达成共识：没有，故没人提这茬儿了。

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？那就得费点儿手脚了。如果以性高潮作为性行为正常与否的标准，那可以说，自慰比性交更有资格称为正常。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在性交中是极少有性高潮的。在女性自慰者中肯定不少见，如果以参与的人数的多寡而论，年龄不同，人数自然不同，至少在单身人群中并不能说占少数。

那么，是什么使得性交成为“中心”呢？我想是因为它是社会所承认的；因为有一系列社会设置：婚姻、家庭、亲属称谓等靠它维系；因为它承担着生产下一代的任务，而相关的社会设置使之社会化。可见其中心地位有一半还是靠生殖来维系的，而另一半也不尽巩固，因为无性的婚姻、家庭也并不鲜见。

我想，关键在于自慰和性交并非互斥的，前者并非象同性恋否认异性恋那样否认后者，更不会动摇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设置。它们存在这种可能性，即成为相互补充、地位平等而非主从关系的两种性活动。在婚后，性交占据主导地位，而在婚前，由自慰占据性活动的主导地位。这对于培养男女两性的自我认同，缓解性张力带来的压力，无疑是非常有利的。

南希·佛莱蒂（Nancy Friday）在其著作《女在上》（Women on Top）中认为：男子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更大的支配权，因此自慰现象普遍而频繁。他们对性唤起的各种徵状十分熟悉，所以男子在恋爱中往往更能区分性和爱。可是女孩从小受管束较严，在母亲面前很难有什么隐私可言。母亲对她拥有全面的权力。南希称这种关系为“母女协定”（the mother/daughter Deal）：女孩向母亲承诺不可以触摸自己的身体，而母亲则回报以母爱。结果，女孩在长大后很容易保持一种对性漠然的态度，认为性主要是男人的事，从而处处被动，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。南希认为：自慰有助于摆脱女孩对母亲的依附关系，而且她写的这一章的名字就叫“赞美自慰”。最后她问道：为什么异性都有权触摸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反而我们自己却不行呢？

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，自慰是人类正常性行为之一种，之所以成为禁忌的对象，完全是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匮乏的结果；而且并不是普遍的，正如很多原始部落都认为自慰是正常的那样。在物质产品相对丰富的今天，这样一种性行为对于缓解性压力、重塑男女社会性别认同、消解男性中心霸权都有着积极的意义，与性交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
[1] 这个小标题之下的内容，由杨春宇写作。

关闭窗口

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未经允许请勿转载，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。

Copyright ©2002-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
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：(010) 62514498 Email: book@sexstudy.org